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在西南地区的整风运动

——以川北区为中心的考察

■ 李绍华 ■ 杨丽梅

(西南交通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31;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四川 成都 610072)

【摘要】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党员干部队伍所出现的思想不纯、作风不正、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甚至贪污腐化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开展针对干部的整风运动。西南局和川北区按照中央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对影响党内团结,影响工作进一步推进的干部作风进行整顿,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当今党的建设和党内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历史经验。

【关键词】新中国;整风;西南地区;川北区

【中图分类号】D6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5]06-0062-04

10.13553/j.cnki.lygg.2015.06.014

整风运动是党的历史上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方式。抗战时期,党于1942年开始进行了第一次整风,整顿党内的学风、党风、文风;解放战争时期的三查三整^①,则是党开展的第二次整风运动。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开展的整风运动,则是党的历史上第三次整风运动。在这次整风中,西南局^②和川北区^③按照中央要求,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扭转了干部作风,为中共在西南地区稳固执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的整风运动,对研究西南地区甚至全国同期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对当前继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促进干部作风转变具有借鉴意义。

一、执政初期西南地区整风的必要性

在解放初期紧张艰巨的工作中,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其表现在川北人民心中是得到肯定的。但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组织上的松懈、行政工作的繁难、胜利喜悦带来的精神懈怠等多重原因,导致党员干部在思想上、作

风上出现了诸多不良倾向,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对于这一情况,毛泽东在《关于指导全党整风运动问题给胡乔木的信》中说:“全党整风运动即将开始,这件事已成为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这一环节不解决,各项工作便不能顺利地向前推进了。”^④

1. 党员发展过速导致的思想不纯

党员干部队伍的政治素养不高,原因主要是发展过速或缺乏训练。曾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在八大报告中这样批评说:“在全国解放前后的两年内,党的组织的发展过分迅速,而在有些地区,这种发展几乎是没有领导,没有计划的,甚至有些地区,在群众还没有发动的条件下,就忙于大量征收党员,建立支部,因而使党的组织一度发生了严重不纯的现象”^⑤对此,中央也有类似判断,认为新中国成立“一年来党的发展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其中之一就是“将一些不够党员起码条件或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吸收到党内来”,“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1949年年终统计,全国党员总数为450万,而1949年一年内新发展的党员数达150万。^⑥川北的情况比之全国更严重,川北区党委曾整理了38个农村支部和23个小组。发现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1950-1957)》阶段成果,立项号:13CDJ005。

作者简介:李绍华,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副教授;杨丽梅,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副教授,博士。

^①三查三整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所进行的政党整军运动。三查在地方上是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部队中是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是指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69-370。

^②西南局,成立于1949年7月,撤销于1954年12月,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简称,是中共中央在西南地区的代表机关,对西南地区的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一市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实行全面领导。邓小平为西南局第一书记。

^③川北区于1950年2月成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四川四个行政区(川北区、川东区、川西区、川南区)之一,直属于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全区人口1700余万,下辖南充、遂宁、达县、剑阁4个专区、35个县和一个直辖市,首府南充市,是1950年至1952年存在的一个省级行政区。胡耀邦曾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川北军区第一政委。

^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367。

^⑤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247。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242。

其中1949年入党的约占2/3,多数为农民和知识分子。^①由于这种控制不严密的增长和缺乏系统训练的背景,使得当时绝大部分新党员缺乏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码认识,思想不纯现象较为严重,甚至一些投机分子和坏分子也趁机进入党内,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党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2. 干部间的门户之见导致的宗派主义

解放后在西南地区工作的党员干部中,来源较复杂,有南下干部、军转干部,这两类干部或因来自革命老区,或因工作经验较为丰富而被称为老干部。另有地下党员干部、解放后新吸纳的党员干部等被称为新干部。而川北区则多了一部分西南局下派干部。^②不同来源的党员干部之间关系并不融洽,貌合神离,甚至影响党的团结并进而影响工作的开展。邓小平曾批评这种工作中的“门户之见”“使党变成狭小的圈子,变成狭隘的宗派,从而丧失了领导作用”。^③

3. 因胜利而导致的干部作风不正

南下干部与部队干部是西南地区的骨干力量。进入西南以来,多数干部能够按照毛泽东“两个务必”的要求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踏实肯干,得到群众认可。但又确实有部分干部如毛泽东所批评的那样出现了“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④这些情绪的出现,导致不同程度的作风不正问题,特别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贪污腐化问题。

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在西南地区征粮、恢复发展生产等中心工作中都有体现。邓小平认识到,西南地区干部的作风问题突出地体现在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上,特别是命令主义“比之其他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命令主义违反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完成不了任务,损害了党的信誉,邓小平给了这种作风一个新名词叫“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⑤在川北区,许多干部不重视国家政策,不精心研究党的指示,不看报纸,不注意了解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未能及时检查工作发现问题,或者辛辛苦苦陷于事务主义的泥坑,未能抓紧工作中心环节,不少同志因为工作的紧迫与繁重,把完成任务与执行政策对立起来。缺乏策略思想,不懂得运用群众路线,甚至用粗暴蛮干的方式进行工作。在征粮剿匪中曾普遍产生命令主义、征办主义等作风。^⑥此外,一些干部背上了“功臣”的包袱,经不起外界的诱惑,贪污腐化,计较名誉地位和生活享受,进而害怕艰苦,不求进步。^⑦

4. 认识不明导致统战中的关门主义

人民政权要在城市迅速立足并得以巩固,必须坚持和发展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民主阶级和各阶层、各界群众的统一战线。但是西南地区党员干部队伍中有不少人对于革命胜利后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不理解,认为革命只需枪杆子不需统一战线的有之、只需工农不要民主人士的有之;统战工作只重现在不重

长远的有之、只看到其策略性看不到其战略性的有之;认为统战工作只是与统战部门有关而与己无关的也有之。^⑧这些问题,都是认识上的问题,导致对党外人士看不惯、不服气,不愿与党外人士合作甚至排斥党外人士。

在整个西南地区,统战工作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西南地区地方干部中,党团员所占比重较低,十五到二十万的地方干部,只有三万人是党员,还有少数团员,党团员只占20%,而非党团员占了80%。因此,要做好西南地区的工作,必须将80%的非党团员团结好,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⑨川北区干部中党团员所占比重尽管比之西南地区稍大,但也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干部属非党干部,统战任务仍然极重。川北区在统战中的关门主义主要表现在:许多老干部看不起新干部和留用人员,认为他们不可靠;他们对年轻的知识分子由于有技术能力可以担任重要职务而产生嫉妒;此外,当时执行的供给制与留用人员可以领薪水的差别也令他们深为不满。以至在许多机关中,对新吸收的知识分子、留用的公教人员,不能以耐心的态度去教育改造,动不动就给戴“立场不稳,思想糊涂”的帽子。^⑩

二、西南地区整风的过程及成效

鉴于党员干部队伍所出现的思想不纯、作风不正、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甚至贪污腐化等问题,毛泽东于1950年5月1日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并提出,整风的范围是全党全军,首先整顿的是干部作风。^⑪

(一) 整风的组织和计划

为更好地领导这次整风运动,中共中央、毛泽东进行了周密部署和指导,并成立了一个指导整风运动的三人委员会,任命时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胡乔木为主任。该委员会主要负责审查各地整风来电并起草复电;全国整风运动开始后,则负责注意整风运动的发展,替中共中央起草指导电,并注意报纸刊物的报道。^⑫

除了成立整风的领导机构外,这次整风也具有较强的计划性。中央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及所属各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各大军区党委,根据自己具体情况,做出整党整干计划,电告中央审查批准,然后按此进行。^⑬后,各机构整风计划陆续上报毛泽东并中共中央,5月11日,邓小平按照中央要求,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西南地区整风的计划。提出“在步骤上地方拟先由省区党委集中县委书记以上干部整风,弄通他们的思想是一切问题的关键,然后经过他们去领导三万人的整风,时间以半个月到二十天为度。”^⑭邓小平上报的计划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并要求将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及上海市委,并在批示中指出:

①中共川北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编印,《川北工作》[Z],第1期:14。

②川北区解放后的最初半年,经过党组织的努力,干部队伍得到一定扩充:南下干部1319名,老区带来的学生361名,共1680名;军队调地方工作的共586名;西南局调来400名;地下党员吸收参加工作1031名。上述共3000多名是川北区的骨干。另外,新吸收的知识分子和录用的旧公教人员6853名;各级政府配备的民主人士443名;未正式分配工作的大学生和各地的工作队员约有5000名。3000多名的川北区骨干,结合12000个其他干部,基本上建立了全区各级各种机构。见中共川北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编印,《川北工作》[Z],第1期:12。

③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56。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8。

⑤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52-153。

⑥中共川北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编印,《川北工作》[Z],第1期:13。

⑦中共川北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编印,《川北工作》[Z],第2期:12。

⑧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5-187。

⑨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6。

⑩中共川北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编印,《川北工作》[Z],第1期:13。

⑪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217。

⑫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367。

⑬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218。

⑭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1。

“其中所说整风步骤,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请你们亦照此步骤部署进行,即先整县委书记以上,再整广大干部。”^①

(二)整风的重点对象

5月9日,邓小平主持召开西南局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布置整风。他在会上指出:“不整好风政策贯彻不下去,与党外合作也合作不好”。“整风的目的是整训干部,使干部从检查工作中发现优点与缺点,优点发扬,缺点改正”,“以达到思想政策水准提高一步,使今年工作任务更好的完成”。他还强调:“有什么样的干部即创造什么样的党、政府及群众组织。因此花时间做此工作是西南的百年大计。”^②5月11日,邓小平在上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西南地区整风计划中,提出整风对象“着重于军队各级干部和地方三万左右的骨干,其中又以县以上干部为主”。^③之后,以干部为对象的整风整干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西南地区整风的重点对象是由军队和老区到西南地区的三万南下干部。邓小平认为,南下干部是新区干部的老师,其影响和示范作用很大,因此,“西南工作的根扎得正不正,就看这三万人的作风正不正”。^④在川北,整风运动也是以南下干部(地方1500人,军队4500人)^⑤为重点对象来进行的。他们大都担任主要职位,代表党的形象,在其他干部和党员中具有榜样作用,在群众中有辐射效应,他们的思想作风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其他干部以及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三)整风的主要方法

根据邓小平的计划和安排,由于西南地区干部少而弱,工作任务繁重而紧迫,“故确定整风的主要方法是联系实际,从检查工作入手,充分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使干部提高一步的目的”。^⑥邓小平要求,西南地区各地整风必须与当地实际工作密切结合,从检查接管城市、剿匪征粮、统一战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项主要工作入手,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审查执行政策是否正确,反省各人作风好坏,得出结论,作出鉴定,以达到使干部在政策水平和思想作风上提高一步的目的。^⑦

川北各级党委按照邓小平的要求,结合中心工作,联系本地实际,拟定了可行的整风计划,组织整风运动学习,以一个县或数个县为单位集中干部进行整训。整训干部以思想教育为主,根据中央指示,采取阅读指定有关文件,总结半年来的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法进行。^⑧川北区在整风中注意了保护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在这样的基础上使干部在思想上、政策上、作风上提高一步,并将参加减租运动的干部普遍轮训一次,为随后的减租运动做好了准备。从八月中旬开始直到九月下旬,全区36个县市约有万人以上先后参加了整风学习。通过扩干会议学习文件,检查与布置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干部的政策、策略、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部份县如南充、岳池还进行了评功检过,评功由下而上,检过由上而下,互相比较,大家评议,取得了较好的效果。^⑨这些做法获得了胡耀邦支持,并要求党内要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评功检过。

(四)整风的成效

这次整风运动在西南地区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党内特别是党的干部中存在和滋长的骄傲自满情绪,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统战中的关门主义问题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克服和遏制。1950年9月11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西南各地的整风情况时说,“根据各地反映,这次整风无例外地收到良好成绩,既能整出问题,在若干问题上打通思想,又能做到不伤害干部的积极性”^⑩即便邓小平在晚年回忆在西南时期的工作时,也毫不讳言地说在西南完成的工作中,改造九十万国民党官员、消灭九十万土匪、发动六千万群众和提高我们部队六十万干部战士的质量,“这四项任务完成得不错”。^⑪

川北区的整风也是于1950年9月份完成的,整风纠正了干部工作中一些不良倾向,保证了清匪、减租、征粮、生产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⑫基于这种形式的整风的有效性,区党委决定每在一个大的工作运动结束以后就进行一次整风学习,把整风制度化。^⑬在这种学习热潮中,川北区党委适时在各个社会阶层中展开普遍的政治学习运动,结合国内外形势和中心任务进行爱国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当然,由于这次整风主要着眼于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问题,而且时间较短,因此,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干部的居功自傲思想、生活腐化的作风仍需进一步深入解决;因组织松懈而导致对党员没有进行严格管理和约束,自由主义之风浓厚,党的生活很不健康。为此,邓小平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建议把党的“组织整顿一下”,避免西南地区“重复老区建党的那些错误”。在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建议中,邓小平还提出:“一个胜利了的党对于党员的要求应该更严格些”。^⑭邓小平的建议给了中央在全党范围内进一步开展整党建党运动以重要启示。

三、西南地区整风的经验及启示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整风运动是一次以干部为重点对象,以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和统战中的关门主义问题为目的的党内教育活动。特别是在西南地区这种解放较晚的地区,党内教育活动为政权巩固、经济恢复等整个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各项中心任务完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之所以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绩,是因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西南地区负责人和以胡耀邦为代表的川北区负责人能严格按照中央规定,结合本地区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

1.善于抓住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群体。邓小平历来重视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进入重庆后,他提出了三大任务:改造九十五万国民党起义、投诚和被俘部队,发动六千万人民群众,提高六十万人民解放军部队。在他看来,“提高六十万”是关键,“‘九十万’、‘六千万’的任务都是依靠于这六十万人为主去完成”。^⑮整个西南地区共有党员二十余万,其中,部队各级党员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345.

②中共中央转发西南局关于干部整风的指示,1950-05-27.

③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1.

④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54.

⑤中共川北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编印.川北工作[Z],第2期:13.

⑥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1.

⑦中共中央转发西南局关于干部整风的指示,1950-05-27.

⑧中共川北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编印.川北工作[Z],第2期:13-14.

⑨中共川北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编印.川北工作[Z],第9期:3-4.

⑩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34.

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43.

⑫中共川北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编印.川北工作[Z],第1期:3.

⑬中共川北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编印.川北工作[Z],第9期:4.

⑭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35-136.

⑮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66.

干部和地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三万人则是骨干,要完成“提高六十万”的任务,最重要的是提高这三万骨干的质量。“西南工作的根扎得正不正,就看着三万人的作风正不正。如果作风不正,根扎歪了,就会贻害无穷。”^①正是抓住了三万人的骨干力量开展整风,并通过整干带动整个西南地区党员干部作风转变,才使得整风运动取得较为圆满的成绩。

2.善于抓住干部的思想问题开展教育。作为新解放区,不仅川北区,整个西南地区干部同其它新解放区一样“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②很多人还没有达到思想入党的高度,在对党的认识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思想偏差不可避免地在工作中体现出来。1951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就曾指出:“在过去,因为我们的党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农村和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对于党员缺少着充分的系统的关于党纲和党章的教育,即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同时,在全国胜利后,一方面,在原有的老党员中,有一小部分人思想上发生了堕落性质的变化;另一方面,因为在发展党的工作上,疏于管理,以致又有许多觉悟不高,甚至思想落后的人,也被接收为党员,并有一些坏分子钻进了党内。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不纯洁的现象。”^③鉴于此,西南地区和川北区在整个整风运动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干部的思想改造。将查思想作为整顿干部作风的前提,将加强干部的培训学习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整顿干部作风的主要方式,以达到干部思想和作风进一步提高,工作顺利推进的目的。

4.善于自上而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主政者的行为是最令人信服的风向标,产生直接的指导作用。邓小平说,“干部在工作中的缺点,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我们领导上也有责任。”^④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只有敢于担当、敢于负责,才能勇于接受批评。所以邓小平总结说,“这次整风获得成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发扬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先从领导上进行自我批评和从批评领导做起,故能解除干部的顾虑,敢于进行自我批评,打通思想。”^⑤川北区则在胡耀邦带动下,各级各部门从上而下总结工作,听取下面的意见和批评,运动进行得稳健扎实。

5.善于运用正确的方针处理干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延安整风总结出的宝贵经验,在这次整风中,西南地区对这一方针坚持得比较好。邓小平在整风前就给各级干部打了预防针,强调这次整风一定要避免过去的缺点,着重启发诱导,通过检查半年来的工作,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根据“惩前毖后”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犯错误的同志着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只有个别品质极坏的,“如严重的贪污腐化及有意识的破坏、抵制党的政策的人,才给予纪律处分”。^⑥胡耀邦也要求川北区在处理干部问题上,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多教育,少处分;如果处理错了,就要平反,“使大家心服”。^⑦1950年下半年川北区党委和行署整风进入总结

检查阶段,他一再告诫不可简单粗暴,不可轻易处分人。^⑧

6.善于将整风运动和群众路线相联系。整风运动的效果好不好,主要看干部是否能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实质是脱离群众的问题。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区别一个工作人员是否有错误,主要看他在工作时是否联系了群众,是否依靠了群众。我们责备干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是因为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脱离群众,不是依靠广大群众去进行工作。我们批评干部乱打乱捕,也是因为这种做法脱离群众,丧失社会同情,而不是批评他们与反革命进行斗争。简单命令方式会给敌人破坏革命工作以可乘之机,会在客观上给敌人以口实去煽惑落后群众,会使自己孤立起来,因而也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⑨邓小平还谈到干部的工作艺术问题,认为干部的“工作艺术就是要善于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并依靠群众”。^⑩川北区能在整风中取得好的成绩,也跟其负责人胡耀邦能走群众路线,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有关。胡耀邦每每参加干部会,必讲“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等,以便使广大的新干部树立正确的思想作风。胡耀邦对群众生产生活极为关心,涉及到群众利益的问题总要尽力解决。他曾发现南充市建设政府办公楼期间对民房的不合理拆迁,便致信市政府:“一年多来,国家修建房屋,不仅浪费很大,而且,因为收回了大量国有土地,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使国家财产和政府威望遭受到许多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应向人民群众公开检讨。”^⑪

7.善于团结统战对象共同开展工作。邓小平特别重视统战工作,认为革命时期需要统一战线,今后同样需要,“不仅需要,而且还要进一步巩固”^⑫。邓小平要求党的骨干要“学会依靠当地原来的人”,必须学会依靠当地原有干部工作^⑬;同时,要学会发动党外人士参加建设,帮助工作,并且要“真正做到党外人士有职有权”。^⑭川北区在胡耀邦领导下,善于团结党外民主人士,统战工作很出色。对统战对象,川北区的主要政策是尽力给予他们关心爱护,避免过“左”行为给他们造成伤害,并且让他们有职有权,保证让民主人士有为有位。如原国民党第七兵团属国民党起义有功部队,其兵团司令裴昌会与胡耀邦相熟,转到地方后被安排到川北行署工作。在胡耀邦的努力下,区党委安排裴昌会做川北行署副主任,领导整个川北区的工业和交通。曾任国民党武胜县参议长的尹子勤,多次借助其身份掩护过不少共产党员,属于对革命有功的开明进步人士,也是被胡耀邦誉为川北民主人士中有才干者,被川北区列为重点保护对象之一。区党委还根据胡耀邦的建议,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对那些曾经给予共产党帮助的党外民主人士以切实的保护,使一百多位党外人士过了“政治关”,既团结他们投入反封建斗争,又保护了农民的积极性。^⑮

责任编辑:唐兵

①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4.

②中南通讯(第8期),1950-6-10.

③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时期文献资料选编(一)[Z].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58.

④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20.

⑤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35.

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59.

⑦黄天祥.胡耀邦在川北[J].百年潮,2001,(2).

⑧中共川北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编印.川北工作[Z],第73期:26.

⑨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21.

⑩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21.

⑪张黎群等.胡耀邦传(1915-1976)(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19.

⑫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55.

⑬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6.

⑭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58.

⑮倪良端.胡耀邦与川北民主人士[J].文史春秋,2005,(1).